

## 論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中魯迅思想的傳播與接受

楊傑銘

### 摘 要

本文旨在處理日治時期《臺灣文藝》和《臺灣新文學》雜誌中魯迅思想的呈現，透過解讀臺灣雜誌中如何書寫魯迅，來理解臺灣讀者學習到怎樣的魯迅思想。在此一時期中，臺灣文壇出現過兩次討論魯迅的焦點：其一是「增田涉與郭沫若的論爭」，其二是「魯迅逝世」。通過這兩次魯迅討論的焦點，可以看到殖民地的臺灣讀者如何站在東亞的特殊位置詮釋與解讀魯迅。在本文中辯證魯迅思想在臺灣的傳播與接受的過程，考察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如何援引中國新文學作家魯迅的思想，展現臺灣文化的特殊面貌。

關鍵詞：魯迅、傳播、抵殖民、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

# The Dissi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Lu Xun's Thoughts in Taiwan's Literary Circle During the Japanese Reign

Chieh-ming Yang\*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Lu Xun's thoughts as presented in the magazines of *Taiwan's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aiwan's New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issue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During this period, Taiwanese literary circle debated twice over Lu Xun. Two articles attracted particular attention: "the Debate between Zeng Tian-she and Guo Mo-ruo" and "the Death of Lu Xun." From these two articles we could understand how readers in colonial Taiwan with their peculiar position in Eastern Asia interpreted and understood Lu Xun. We explore the process Lu Xun's thoughts was disseminated and accepted in Taiwan and the efforts Taiwanese literary circle made in creating a new page of Taiwanese culture.

**Keywords:** Lu Xun, Taiwan's Literature and Art, Taiwan's New Literature.

---

\* Yang Chieh-ming received an MA from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 論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中魯迅思想的傳播與接受<sup>\*</sup>

楊傑銘<sup>\*\*</sup>

## 一、前言

自臺灣歷史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時代對魯迅的引介與詮釋是不斷地在進行，而其背後不同階級、族群的知識分子在輸入魯迅思想時所抱持的相異詮釋視角，呈現了「一位魯迅，多種詮釋」的多元化論述。當然，這難免與傳播者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但這更包含了「傳播什麼？」與「怎麼傳播？」的問題。也因為如此，魯迅與臺灣文學之間諸多政治、文化問題，所產生異於中國、日本、韓國，甚至是其他國家的「魯迅思潮」的發展，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由於目前臺灣國家定位的未明確，加上對中國侵略臺灣、統一臺灣的恐懼，使得在他們的論述中，鮮少提及臺灣新文學發展與中國新文學之間的關係，更不用說魯迅對臺灣作家影響的相關研究，在目前研究成果上還是屬於零星的狀態，並未有較為系統且全面的討論。當然，「論述」不可避免的帶有政治意識形態，但若單以魯迅來看對其他國家、地區的影響，似乎太過強調魯迅的影響力與能動性。面對現今文學史中充斥著以政治意識形態作為前提的論述，讓我們越是無法清楚地瞭解到魯迅與臺灣新文學之間的關係。然而，究竟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魯迅與臺灣新文學的關係呢？陳芳明的說法可以提供我們對此議題的思考角度：

魯迅是屬於中國新文學的巨人，任誰也無法否認這一個事實。然而，他的思想與作品一但離開中國國境，而陸續在東亞之間旅行時，有關魯迅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9年1月2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年7月30日。

\*\*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的文學詮釋權，就再也不是中國能夠獨占。……他的文學藝術展開時間旅行與空間旅行之際，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國境地理，都開始出現歧異而豐富的解釋。<sup>1</sup>

從上述這文字中可以瞭解到，陳芳明並未否定「魯迅思潮」對臺灣的影響，只是反對以魯迅作為中心來看臺灣的文學與歷史的發展。因為如此的敘事方式，很有可能先入為主的預設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因此，近年來他對於「魯迅文學」對臺灣影響的研究，主張以「東亞」作為觀察視角，從而希望以地域上的臺灣、日本、香港、韓國等各個地方作為觀視的主體，來看魯迅思想對各地方的影響，讓魯迅成為「世界性魯迅」的概念，討論魯迅思想對東亞各地方文學與文化的影響。

若依循這個概念來看，日治時期的臺灣讀者在閱讀魯迅作品時，會因為臺灣特殊的文化空間產生「適應」於臺灣的魯迅思想，特別是1930年代在《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兩本雜誌上，曾出現過兩波「談論魯迅的焦點」，一次是增田涉與郭沫若之間的論爭，其二是魯迅逝世。這兩次事件在臺灣文壇都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也引起臺灣讀者的關注。<sup>2</sup>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波的「談論魯迅的焦點」，並非來自臺灣內部對魯迅的探討，而是外在因素導致臺灣本島突然之間關心魯迅議題。增田涉與郭沫若之間的論爭，對臺灣人而言，不但是代表著殖民母國與文化母國的文化衝突，也呈現出中國文壇不同派系勢力的爭執。而臺灣作為小小的殖民地，卻可同時看見兩大作家在臺灣文壇論爭，對臺灣人而言是何等的大事，因而引起臺灣讀者的關心。而魯迅的逝世同樣地對臺灣文壇來說是相當大的震撼，畢竟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臺灣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並未如臺灣與日本的關係來得密切，而魯迅應當可以算是臺灣讀者最為熟悉的中國作家。因此，魯迅的死，也同樣掀起臺灣讀者對魯迅的關注。

- 
- 1 陳芳明，〈臺灣魯迅學：一個東亞的思考〉，《文訊》，第248期（2006年6月），頁8。
  - 2 目前學界對魯迅思潮在臺灣的傳播多為斷代式的討論，而與本論文較為相關的討論：陳芳明，〈魯迅在臺灣〉，收入於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5月）。以及中島利郎著、葉笛譯，〈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與魯迅〉，收入於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5月）。筆者在本論文延續兩位學者的說法，更進一步的處理魯迅思潮在一九三〇年代《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的傳播情形。

從這兩次事件中可以探討的是：面對日本殖民統治超過三十年的時間，新一代臺灣知識分子多數是受日文教育成長。在這樣的情形下，臺灣人究竟是如何解讀魯迅的作品與思想，並進而回到臺灣文壇觀看《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兩雜誌在臺灣發展的狀況，經由對當時臺灣作家對自身的定位，才能夠理解臺灣作家是如何解讀魯迅的思潮？其目的性又是甚麼？這將是本文聚焦處理的問題。

## 二、日治以來魯迅思想在臺灣傳播概況

日治時期自新舊文學論爭以來，中國新文學在張我軍於《臺灣民報》的強力主導下，轉載了許多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作品，透過傳播媒體的影響力，在臺灣發揮了不小的作用，改變了原本傳統文人獨占文壇的局面。而魯迅的譯作與作品，也是他在此時期介紹給臺灣民眾認識的，奠定了一般讀者對魯迅的認識。

當時的中國新文學深受世界啟蒙思想、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其背後的意義，隨著時代的演進，也包括了中國從晚清到民國初期民族意識的建構。也就是說，當張我軍在一系列中國新文學理論在臺灣的建構過程裡，所謂「中華民族」的概念，也隨之滲透至臺灣內部，把臺灣納入新興的「中華民族」之中來談論。<sup>3</sup>像是張我軍的〈詩體的解放〉、〈研究新文學應讀什麼書〉、〈新文學運動的意義〉、〈隨感錄〉等論文，都可以看見他將中國新文學觀念傳播到臺灣的痕跡，試圖以接受過現代化洗禮的中國新文學思維來改造臺灣的文化，讓臺灣在接受「中國化」的過程裡，同時也接受了中國式的「現代化」。<sup>4</sup>

---

3 從張我軍傳播中國新文學理論的「破」與「立」之中，我們可以看見中國白話文的引介，實是作為改革民族弊病的必要手段，藉由普及西方現代化的知識，強化大眾對進步思想的認識，這也成為這一批新興知識份子所肩負的重要任務。而胡適的「八不主義」與陳獨秀的「三大主義」，也原都是用來改革中國傳統文學陋習的，卻被張我軍在「橫的移植」下完全帶到臺灣文壇。然，這並不代表著臺灣的傳統文人就沒有「西化」、「現代化」的思維，新與舊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如此的截然二分，不論是傳統文人或是新文學作家都深受時代脈動下現代化思潮的影響，「現代化」的觀念其實在不知不覺中注入處於「文學轉型期」的臺灣社會裡。

4 張我軍在《臺灣民報》中擔任編輯的「守門人」角色，成功地將中國新文學、新文化思潮引進臺灣文壇。這其中具有兩層的意義：第一、反封建、反傳統的抵抗色彩，特別是針對臺灣的傳統文學提出抨擊，進而建構臺灣的新文學、新文化。第二、民族性的抵抗，希冀引進中國新文學、新文化作為：「世界」→「中國」→「臺灣」的現代化文化路徑，藉以抵抗日本殖民政府殖民政

從張我軍開始，轉載中國五四文學、文化的作品，即有擺脫日本殖民現代性的影響，希望從中國獲得更多的現代文明思潮。此外，利用日本殖民政府默許的現代化思潮（批判漢民族民族性），實則進行中國民族認同之鏈結。如此的鏈結為的是追求獨立、自主的平等機會，希望引介漢民族勢力，以及中華民國的建國精神，共同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也包含日本異族的統治。

除了張我軍外，許乃昌、蔡孝乾、葉榮鍾、黃得時等人都寫過與魯迅相關的論述，而且站在不同的位置，對魯迅及其文學進行解讀。蔡孝乾的〈中國新文學概觀〉，是此時期討論魯迅最為詳細的論述，雖說僅在文章中論及了魯迅的短篇小說〈孔乙己〉，但文章裡面對魯迅的生平、經歷與創作的風格都有概略的介紹，有助於臺灣讀者對魯迅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對臺灣的新文學家而言，魯迅《吶喊》時期對封建社會、傳統社會的批判，即是當時臺灣文壇所需的新文學、新文化思潮。

葉榮鍾在《南音》的〈文藝時評〉中談論魯迅時，指桑罵槐的以批判「蔣皇帝」<sup>5</sup>在中國高壓集權的暴行，來暗批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的言論限縮。即便當時魯迅與創造社同仁共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葉榮鍾並不會隨著外界的說法將魯迅的思想視為轉向，而看到的是魯迅本質的人道關懷。賴和、王詩琅的魯迅思想傳播，則帶有較多的左翼色彩。不過，與葉榮鍾相同的是，臺灣作家談論魯迅的特色時，他們並不以左翼文學理論來闡述魯迅的文學與思想，而是以生命經歷、生活經驗來看待魯迅的左翼路線，將「左翼」當成一種思考方式，而不是「主義」的文學理論。如此的強調，所看重的是魯迅的反抗精神，這也是中國與臺灣之間互通的真

---

「殖民性」與「現代性」雙重糾雜的困境。也就是說，張我軍轉載魯迅的相關著作時，張氏是站在改革臺灣封建、迂腐的傳統文化位置與日本殖民政府是進行合作的，為的是加速臺灣邁向現代化的潮流，邁向現代文明之列。然而，雙方對於魯迅解讀方式的不同，造成魯迅思想呈現了各自解讀的情形：日本殖民政府藉由魯迅作品來批判中國的國民性，以此合理化對臺的「殖民現代化」教育。而張我軍則將魯迅的作品視為建構臺灣新文學、文化的重要素材，並透過魯迅的作品將臺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結合，成為主流與支流的相互依存關係，試圖利用如此的鏈結引進中國所帶來的現代化文化思潮，來抵抗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的「殖民現代化」教育。針對張我軍的魯迅思潮傳播，筆者在其他篇論文已有詳細討論。詳細情形可參見楊傑銘，〈民族的幽靈·現代化的追尋：論張我軍《臺灣民報》的魯迅思潮引介〉，《臺灣學研究》，7（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年6月）。

5 擎雲（葉榮鍾），〈文藝時評〉，《南音》，1：3（昭和7年（1932）1月22日）。

諦價值。

綜觀臺灣作家談論魯迅的不同詮釋角度，可發現因為個別作家的意識形態、政治光譜、文學品味的不同，對於魯迅及其文學的談論也會不盡相同。然而相同的地方，在於臺灣被殖民的政治環境，以及臺灣與中國之間在文化交流上的隔閡，也都造就臺灣作家在閱讀魯迅時，都會看到魯迅的抵殖民意識，以及反抗不公不義的壓迫的普世精神。到了1930年代以後，在《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中有兩波「談論魯迅的焦點」，涉及到跨越中、日、臺三地的文化交流，也讓臺灣讀者對魯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以下我們將先概述1930年代臺灣左翼運動與文化刊物出版的情形，瞭解當時後臺灣文化圈的概況，繼而再進一步探討《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中的魯迅思想傳播與接受。

### 三、1930年代臺灣左翼運動與文化刊物情形

1930年代魯迅的思想開始左傾時，同時期的臺灣社會也有很大的變化，雖然臺灣左翼文化運動受到臺灣總督府的打壓，一直沒有很成熟的發展，不過在不同組織的文化運動下也獲得一定的成果。從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臺灣民眾黨、臺灣共產黨等組織的政治運動，在臺灣奠定左翼文化思潮的基礎。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左翼」卻非鐵板一塊的理念完全相同，在左翼文化陣線下仍有不同的派別，彼此之間也會因為不同的理念而有所衝突。特別是社會局勢正逢經濟大蕭條，工廠倒閉事件頻傳、失業人數節節高漲，如此的社會氛圍激起極左勢力的抬頭，不但抵制與資產階級合作，並且排除左翼陣營中溫和路線，像是當時的楊逵、連溫卿都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同路人在左翼陣營是被批鬥的對象。<sup>6</sup>

這樣的情況呈現出臺灣左翼政治運動紛雜，社會情勢並未因為極左勢力極速擴張下而在日本殖民政府手中獲取更多的資本。相反地，日本高壓統治的軍國主義勢力抬頭後，順勢的對不同的左翼文化團體各個擊破，使臺灣的左翼政治運動不得不轉向以文化層面繼續進行。細言之，1931年9月18日日本對華發動侵略戰爭，迅速

---

6 參見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

地占領東北三省，開啟了日本軍國主義拓展版圖的野心。也因為如此，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統治方針也逐漸改變，從大正民主時期較為開放的統治方式，漸漸緊縮臺灣內部的言論空間，並開始對臺灣島內左翼政治運動進行鎮壓，像是臺灣共產黨、臺灣農民組合、臺灣文化協會等左翼社團於1929年到1931年先後多次遭到逮捕，臺灣的左翼政治運動也逐步地走向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文學、文化形式所興起的左翼文化實踐。

伴隨臺灣左翼運動發展的，是左翼文化刊物前仆後繼的相繼發刊，像是《臺灣大眾時報》（1928）、《伍人報》（1930）、《臺灣戰線》（1930.8）《洪水報》（1930.8）、《明日》（1930.8）、《現代生活》（1930.10）、《赤道》（1930.10）、《新臺灣大眾時報》（1930.12）、《臺灣文學》（1931.9）等左翼刊物承繼了左翼精神。雖然這些雜誌的發行時間都相當的短促，且每一期都面臨著查禁的命運，但它們的存在可是為臺灣左翼運動持續不斷發展的成果。到了《南音》（1931.1）、《フオルモサ》（《福爾摩沙》）（1933.7）、《先發部隊》（1934.7）雜誌，除了持續地以左翼的精神作為宗旨，藉由文字的方式來實踐臺灣左翼文化的精神外，透過在雜誌中介紹日本、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左翼文化發展的概況，某種程度上形成跨地域、跨國家的左翼陣線聯盟。但是相對於前一個時期而言，臺灣左翼文化運動在拒絕與右翼團體合作之後，並未因此壯大左翼文化陣線，也沒有因為激進反動的路線從日本殖民政府手中獲取更多的資本，反倒因為彼此的嫌隙與分裂，削弱了臺灣抵殖民運動的力量。

這樣的情形，一直要到1934年「臺灣文藝聯盟」的成立才有所解決。「臺灣文藝聯盟」的誕生，可說是左翼與右翼政治、文化團體於1930年代首度的大規模合作，以聯合陣線的形式重新出發。臺灣文藝聯盟是由張深切等人的主導下，串連全臺文化人士建立的文藝團體。臺灣文藝聯盟的組成，最重要的目的是針對日本殖民政府的壓迫進行反動，是為了區隔臺灣與日本在文化上、身分上的差異，逐漸讓「臺灣」凝聚成一個共識，成為自主的空間，這與過去的抵殖民運動形成明顯的差異，也可以說是以不同形式來進行抵抗。<sup>7</sup>

---

7 如張深切在〈對臺灣新文學路線一提案〉所言：「臺灣固自有臺灣特殊的氣候、風土、生產、經



臺灣本土主義的高漲，很明顯的是受到左翼文化思潮在地的深化，以及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爭的影響。當知識分子逐漸將視角轉移到臺灣一般大眾，因而出現「臺灣話文運動」與「民間文學採集運動」希望能真正落實照顧普羅大眾。透過這些運動，他們也開始發現到，臺灣特有的語言、風俗、習慣是獨一無二的資產，經由對臺灣土地的認同，不但可以與普羅大眾作連結，亦可以破除殖民現代化的焦慮。<sup>8</sup> 然而，以聯合陣線形式存在的「臺灣文藝聯盟」，似乎也無法解決內部理念不合以及人事問題，因而在成立年餘之後，因為路線問題而宣告分裂。具有鮮明左翼色彩的楊逵、吳新榮、郭水潭等人的離開，另組「臺灣新文學社」，開啟了《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分庭抗禮的局面。<sup>9</sup>

離開「臺灣文藝聯盟」而另創「臺灣新文學社」的作家群，最主要是集中於臺

---

濟、政治、民情、風俗、歷史等，我們要把這些事情，深切地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分析出來一察其所生，審其所成，識其所形，知其所能一正確地把握與思想，靈活底表現於文字，不為先入為主的思想所束縛，不為什麼不純的目的而偏袒，只為了貫徹「真實」而努力盡心，只為審判「善惡」而鑑研工作。這樣做去，臺灣文學自然在沒有路線之間，而會築出正確的路線。總而言之，我所要主張的，是臺灣文學不要築在既成的任何路線之上，要築在於臺灣的一切「真、實」的路線之上，以不即不離，跟臺灣的社會情勢進展而進展，跟歷史的演進而演進，就是。」張深切將臺灣文學的路線界定為臺灣這一個空間環境所產生的文學，明確地將臺灣視為一個獨立的想像空間。當然，張深切的說法不能代表全部臺灣作家的想法，但由此觀之，可發現臺灣新文學的發展，從張我軍引介中國新文學、新文化來抵抗日本殖民現代化的文化滲透，逐漸轉向以臺灣作為主體的思考模式，不再去依靠中國作為對抗日本的母體，而是具有自覺意識的以臺灣為本位作為抵殖民的重心。

- 8 然而，「臺灣文藝聯盟」雖說有著以臺灣為中心的創作意識，但相較於前期的《南音》雜誌來說，卻也帶有較多的菁英色彩，反對民間文學採集運動，認為這是「助長迷信」的作法。就如同陳建忠所言：「很顯然地代表了《南音》之後，繼續主導臺灣文學發展的《臺灣文藝》領導人並未延續前此民間文學提倡者的主張，而以更強烈的『啟蒙思想』試圖推行『文藝大眾化』的課題，是這種『菁英心態』使《臺灣文藝》不再支援僅僅是採集、保存民間文學（因內含迷信思想），而要求作家創作（改編）題材有趣而民眾熟悉的作品來啟蒙、慰安一般民眾。」陳建忠，〈民間之歌，民族之詩一日據時期民間文學採集與新文學運動之關係初探〉，《日據時期臺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年），頁84。
- 9 根據梁明雄的說法是，臺灣文藝聯盟除了內部理念不合之外，楊逵對於張深切專斷的選稿，以及與張星建共同把持社務相當不滿，在諸多人士問題之下楊逵才會離開臺灣文藝聯盟。而留學日本的「福爾摩沙」系統，大多都繼續支持張深切且留在《臺灣文藝》，像是吳天賞、張文環、巫永福、劉捷就被稱作「文聯四天王」。但筆者以為，文學場域的權力關係，亦是不可忽略的問題。特別是當時臺灣的反抗陣線聯盟僅有「臺灣文藝聯盟」此一組織，因而領導權、資源的爭奪也成為彼此內鬩的原因。此外，「臺灣文藝聯盟」的分裂很大原因是彼此的利益與人事問題。資料參考自梁明雄，《張深切與《臺灣文藝》研究》（臺北：文經出版社，2002年1月）。

北地區、彰化地區、佳里地區三大地區的作家。<sup>10</sup>臺灣新文學社的機關雜誌《臺灣新文學》的內容，不時都有刊載日本左翼文壇的消息以及日本作家的作品，試圖強調其左翼的特性，來與具有純文藝色彩的《臺灣文藝》作區隔，實踐楊遠不斷地提倡「文藝大眾化」與「大眾文藝」的左翼論述。但與《臺灣文藝》創作理念相同的地方，在於以「臺灣」為本位的書寫也是《臺灣新文學》所欲追求的方向。<sup>11</sup>

不論是「臺灣文藝聯盟」或「臺灣新文學社」，對於文學創作的核心，都賦予「臺灣」獨特的風貌，是異於日本、中國其他地方而存在著「臺灣式」的說法。也就是說，「臺灣」這一符碼，是被賦予抵殖民、與社會大眾連結的性質，經由對「臺灣的」文學、文化的重視與生產進行政治性的文化抵抗運動。當然，如此的臺灣獨立的文化個體，是建構於「臺灣的」特殊環境與歷史脈絡，所謂的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在日本殖民者的壓迫之中被縫合，成為交混的臺灣意識。換句話說，日本對臺灣的統治是否為異族的統治不再那麼的重要，中國是否為臺灣的文化祖國也並不再是人們關切的議題，重要的是，臺灣人民所遭受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是一種具有跨國、跨文化的階級問題，卻也存在著地方空間、歷史、民族所延伸的區域特殊性。

面對臺灣文壇的改變，在此時期的魯迅思想輸入的形式也有所轉變。由於臺灣新文學的發展邁入成熟的階段，過去臺灣作家利用魯迅的作品作為學習創作的範本，並利用魯迅的作品補足文壇青黃不接的情況已逐漸減少。也就是說，魯迅的小說早已是臺灣人的基本常識，購買、閱讀魯迅的小說在當時雖然是被限制的，但沒

---

10 當時「臺灣文藝聯盟」與「臺灣新文學社」除了少數人是壁壘分明的外，仍是有部分作家游移於兩個刊物之間並未有明確的表態，像是賴和、賴明弘皆是如此。

11 楊遠就曾經提及：「當我們談到「臺灣味」時，就本質而言，問題在於內容而不在於表現形式。這當然不限於水牛和查某嫺的問題，從臺灣特有的自然、生活面（習慣、制度、風俗）到受制於這些條件的臺灣式的思考，所有層面的問題都涵蓋在內。例如臺灣的日本人和內地的日本人並非完全相同；而臺灣人和內地的日本人對著在臺灣的日本人的看法，還有臺灣人對內地的日本人的看法，也都不盡相同吧。……前一陣子討論的「殖民地文學」，我覺得是指描寫殖民地臺灣的真實面貌。而藝術之「臺灣味」的本質，也是這樣子透過臺灣式的看法、想法，構思並徹底描寫臺灣式的自然、臺灣式的性格、臺灣式的生活。……不過，無論選擇什麼表現形式，都必須能傳達臺灣式的現實，給人臺灣式的印象。」

有遭受太多外界的壓力。<sup>12</sup>如同中島利郎所言：

在日本統治期的臺灣，不太可能以正規途徑販賣中文原文的單行本，對使用日語表示抵抗的臺灣知識分子和對「祖國」文學懷抱興趣的作家們，魯迅等的原文作品，當然不是很多的，雖是偷偷地卻能相當程度地閱讀。<sup>13</sup>

然而，臺灣讀者對魯迅在左傾之後的發展情況所知不多，這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魯迅的雜文產生於特殊時空環境的特性，以及中國左翼文化陣線的發展相當複雜。因此，臺灣讀者在瞭解上會產生隔閡與障礙。

概略來說，此時期與魯迅相關文章的刊載有過兩次高峰，第一次是在1935年增田涉的〈魯迅傳〉連載於《臺灣文藝》，因部分內容的翻譯問題引發郭沫若與增田涉兩人在《臺灣文藝》上的論爭，在臺灣掀起不小的波瀾。另一次則是1936年魯迅的逝世，也引起文壇不小的迴響，在報章雜誌上都可以看見追悼魯迅的文章。以下，筆者將直接以這兩次的事件作為討論焦點，探討此時期魯迅思想在臺灣傳播的概況。

#### 四、增田涉〈魯迅傳〉與郭沫若的論爭

增田涉的〈魯迅傳〉，原本刊載日本《改造》雜誌上，經由頑鋏翻譯成中文的內容後在《臺灣文藝》一共連載了四期，成為臺灣報章雜誌上最為完整介紹魯迅生平的傳記文章，也是日治時期臺灣文壇唯一一篇介紹魯迅傳記的專論。<sup>14</sup>增田涉在〈魯迅傳〉中，從魯迅幼年生於封建家庭開始談起，詳細敘述魯迅的啟蒙思想與

---

12 如同鍾理和自述提及：「入村塾後，閱讀能力增高，隨著閱讀範圍也增廣，舉凡當時能夠蒐羅到手的古體小說，莫不廣加涉獵。後來更由高雄嘉義等地購讀新體小說，當時大陸上正是五四後，新文學風起雲湧，北新版的魯迅、巴金、郁達夫、張資平等人的選集，在臺灣也可以買到。」鍾理和，〈鍾理和自我介紹〉，《鍾理和全集》，第六集（高雄：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2003年12月），頁218。此篇文章是鍾理和應林海音、王鼎鈞之邀，希望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號的《文星》介紹本省籍作家而撰寫。

13 中島利郎著、葉笛譯，〈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與魯迅〉，收入於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5月），頁64。

14 根據中島利郎的考察，增田涉的〈魯迅傳〉，原發表於一九三四年日本《改造》四月號雜誌上。

中國社會脈動的關聯性，並概略論及魯迅在辛亥革命、五四文化運動重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魯迅到了1925年面對國民黨政府鎮壓「左傾」改革青年的流血衝突，所出現的心情轉折的徬徨、矛盾心境，直至與創造社、太陽社論爭之後才又有較為積極的態度來進行社會改革運動。

從增田涉的〈魯迅傳〉可以發現，他以第三人稱的立場，夾敘夾議的詮釋魯迅的生平概況，透過對魯迅前半生生活概況的整理，嘗試理解魯迅思想的核心與演變。但在敘述過程中最引人爭議的是，在描述到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論爭的事件時，增田涉似乎有意站在魯迅的立場來詮釋這一場論爭，貶抑創造社、太陽社的歷史評價。然而，增田涉的〈魯迅傳〉真正引起郭沫若的不滿與回應的，是刊載於《臺灣文藝》上的〈魯迅傳（一）〉的內容，有關羅曼·羅蘭給魯迅的一封信：

這個一大文豪的盧蘭，對他——魯迅特地寫了一篇很感激的批評，寄給中國去。然而很不幸！那篇歷史的批評文學，因為落於和魯迅抗爭之「創造社」手裡，所以受他毀棄，那就不得發表了。<sup>15</sup>

〈魯迅傳〉中談到了創造社押扣了羅曼·羅蘭要給魯迅的信件，使得此信件無法公諸於世。對此，郭沫若在下一期的《臺灣文藝》，也提出嚴正的抗議和質疑：

據我所知道的魯迅的《阿Q正傳》，是創造社的敬隱漁君（四川人）替他翻譯介紹的，同時還介紹過我的幾篇東西，時候是在1925年。那時候的盧蘭、創造社、魯迅都還不是左翼，創造社和魯迅的抗爭是在1928年，其中相隔三年，怎麼會扯出這樣的一個奇謊？我現在敢以全人格來保障著說一句話：「創造社絕不曾接受過盧蘭的『那篇歷史的々批評文字』」盧蘭和敬隱漁君都還現存著，可以質證。還有，諸君要知道1925年前後的創造社，它是受著語絲系、文學研究會系的刊物所夾攻的，盧蘭批評魯迅，為什寄到創造社？為什盧蘭不說話？魯迅們的這一套消息又從何處得來？只要稍加思索，便知道是天大的奇事。將來我另有機會要來弄個水落石出的，現刻寫這幾句來報告諸讀者，可見得所謂傳記歷

---

15 增田涉著、頑鏡譯，〈魯迅傳（一）〉，《臺灣文藝》，第2卷第1期（昭和10年（1935）1月1日）。

史是怎樣靠不住的東西。<sup>16</sup>

身為創造社成員的一分子，郭沫若對於創造社所受到的污衊，會有如此強烈地不滿與憤慨是可以理解的。<sup>17</sup>而從郭沫若的談話中可以瞭解到，郭氏不但否認創造社曾取得羅曼·羅蘭要給魯迅的書信，更提出魯迅與羅曼·羅蘭的認識，是透過創造社社員才能搭上線的證據加以反駁。郭沫若的強硬態度，使得增田涉在《臺灣文藝》上也提出澄清，他認為他的本意並非說羅曼·羅蘭將信寄給創造社，而是說羅曼·羅蘭的這封信落入創造社的手中，頑鍥在翻譯上的錯誤間接導致郭沫若與增田涉的衝突。然而這裡的重點是，雖然羅曼·羅蘭並未寄信給創造社，但從增田涉的回應裡還是認為創造社扣押了此封信件。

雖說增田涉將問題的癥結推給了頑鍥的翻譯，可是按照常理來說，增田涉會使用流利的中文，不太可能頑鍥的翻譯版本自己不再校閱過，因而我們可以合理的聯想，頑鍥在語句翻譯上也許是獲得增田涉的同意，或者是自己揣想增田涉的意思，來做如此語意的更動，而如此的衝突卻也含著濃厚的刻意成分在內。<sup>18</sup>

究竟這一封羅曼·羅蘭的信件是否有落入創造社手裡，被創造社同仁扣押，已然成為歷史懸案。也許郭沫若真的不知情這封信的下落是否被創造社所取得，因而面對增田涉對創造社的指控有著強烈的憤怒，認為當事者都還活著，希望將問題查得水落石出。由此就可以理解到，郭沫若在面對〈魯迅傳〉的「污衊」時，他的態度會如此氣憤，會以「所謂傳記歷史是怎樣靠不住的東西」來加以反擊。

回過頭來說，增田涉與魯迅之間是有著一段深厚的情誼，早在1931年經佐藤春夫、內山完造的輾轉介紹之下兩人開始有了接觸，且成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的翻譯者，與魯迅進行近距離的接觸與對談。根據記載，當時增田涉每天都必須到魯迅寓所，與魯迅商討如何翻譯《中國小說史略》，之後又討論了《吶喊》、《徬

16 郭沫若，〈魯迅傳中的謬誤〉，《臺灣文藝》，第2卷第2期（昭和10年（1935）2月1日）。

17 郭沫若之所以會看到增田涉刊載於《臺灣文藝》上的〈魯迅傳〉，原因在於賴明弘拜訪郭沫若時同時贈送郭沫若當期的《臺灣文藝》，因此，意外的促成中國、日本的兩位作家在殖民地臺灣雜誌上的論爭。

18 中島利郎同樣也認為頑鍥是刻意在翻譯時做文字內容的修正：「然而，把上面的譯文和原文一起比較起來看，就可以明白，頑鍥的翻譯裡有著意圖性的增補和看錯文意……」。中島利郎著、葉笛譯，〈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與魯迅〉，收入於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頁6。

徨》二書的內容，一直到當年年底增田涉歸國為止，兩人密切往來的時間長達八個月。這八個月中，兩人一起觀賞電影、展覽會、互贈禮品的相關紀錄就有三十餘次，另外在魯迅往後的生命中，增田涉也是他相當重要的友人。據不完全的統計，在他們交往的五年之中，增田涉寄給魯迅九十餘封的書信，而魯迅也寄給增田涉達六十四次，兩人書信往來的如此頻繁，因而我們可以把增田涉視為是與魯迅來往最密切的日本友人之一。<sup>19</sup>

〈魯迅傳〉的內容，不但是增田涉近身觀察魯迅的紀錄，更是魯迅在與增田涉對談過程裡完成的半自傳體傳記。延伸來說，〈魯迅傳〉中對魯迅與創造社的論爭的描述，不但是增田涉以自身的立場、意識形態來做敘述，更是魯迅自身對此事的看法。能做如此的推斷，最主要在於魯迅曾於給姚克的信件裡提到此事，他說道：

但是，羅曼·羅蘭的評語，我想將永遠找不到。據譯者敬隱漁說，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給創造社——他久在法國，不知道這社是很討厭我的一請他們發表，而從此就無下落。這事已經太久，無可查考，我以為索性可以不必要搜尋。<sup>20</sup>

魯迅給姚克的書信內容，正好印證了增田涉的說法其實是來自於魯迅，而非他自己所編纂出來的虛構傳記內容。

另外，增田涉與郭沫若的論爭後，也寄給了魯迅《臺灣文藝》，讓他瞭解郭沫若的回應，而魯迅是這樣簡短的對這一件事作出回應：「《臺灣文藝》是不有趣的。郭君說了什麼是吧！這位老師盡全力維護自己光榮的古旗，是位好漢！」<sup>21</sup>有關此事情，魯迅作了簡短的回應，似乎不想再對此事多說些什麼，他的立場如同寄給姚克信件所說到的：「我以為索性可以不必要搜尋」，希望這件事能到此為止。

較為有趣的是，魯迅在翻閱過《臺灣文藝》後，對其作出「是不有趣的」的

---

19 資料參考周國偉，〈魯迅最親密的日本友人——魯迅與增田涉〉，《魯迅與日本友人》（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9月）。

20 魯迅給姚克的信件。收入於《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頁519。

21 魯迅給增田涉的信件。收入於《魯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頁343。（信件原文為日文，此處為筆者翻譯。）

評價。我認為，魯迅客觀的點明了《臺灣文藝》內容的缺失，比起日本與中國的刊物，相較來說確實是相當無趣的。臺灣在文學發展的歷程中，並未像中國、日本有著長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加上日本統治下臺灣新文學發展處處遭受設限，不只是書籍的不流通，報章雜誌的言論也都被監控，造成臺灣文化刊物的內容是比較稚嫩且「不有趣」的。在那個時代，魯迅對殖民地臺灣的認識當然不多，就像他曾對張我軍說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臺灣這些事暫且放下。」<sup>22</sup>他對於臺灣現況的理解是不多的，加上中國「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也就自然不會進一步深思，去思考《臺灣文藝》究竟是為何會變得那樣不有趣。

回過頭來說，作為魯迅代言人的增田涉，所撰寫的〈魯迅傳〉的內容，是以何種角度來看待此場論爭，相當程度也反映了魯迅的立場與態度。而增田涉是如此描述論爭的情況：

這時在上海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從革命軍中所逐出的共產主義的文學家，驀然的論戰「革命文學」。在政治行動最前線的不容活動的他們，都拋掉銃砲來執著鋼筆了。異常銳氣的呵——逃出廣東的成仿吾爲了領首。同馮乃超、李初梨再續了「創造社」，武漢脫出的蔣光赤、錢杏邨等所辦的「太陽社」等爲其中心的勢力。他們都有了經驗的革命實際工作，較從來的革命文學者還有堅實的韌力的，然而只以自負的英雄主義爲憾，和革命挫折的憤懣的災意。似帶幾分極左的兩可主義的謬誤，他們把這立場而開始攻擊魯迅了。那魯迅要闡明普羅文學是什麼？就翻譯了愈那遮爾斯基的文學論、蘇俄文藝政策，建設普羅文學理論，和他們戰鬥。因革命文學論戰異常譁囂，所以反動政府就對左翼文學家下一大彈壓了。出版新書的書局都被封鎖，露國作家的書籍至齊賀安德禮也受禁止了。「創造社」、「太陽社」多一齊潰滅。……<sup>23</sup>

22 本篇寫作於1927年4月11日，並為張秀哲所翻譯的《國際勞動問題》一書的序文，後收入於魯迅，〈寫在《勞動問題》之前〉，《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頁444。

23 增田涉著、頑鍬譯，〈魯迅傳（四）〉，《臺灣文藝》，第2卷第4期（昭和10年（1935）4月1

在文中增田涉批判「創造社」、「太陽社」，是不具左翼思想實質內涵的社團，且以極左的路線來完成自己的英雄主義，並賦予「創造社」、「太陽社」因對魯迅的攻擊，造成中國左翼文學受到打壓的罪名。當然，增田涉與魯迅之間的友誼是眾所皆知的事情，因此他會以如此絕對、情緒性的話，來談論此次的論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增田涉在撰寫〈魯迅傳〉時，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爭，也才結束沒幾年，加上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創造社與魯迅之間並未因此而和解。郭沫若與魯迅也在1930年打過筆仗，一直到1932年兩人之間陸續有過爭端，並未因為「左聯」的成立而少有停歇。從這樣的情形，可看出雙方之間派系、門閥問題之嚴重，因此我們可以把增田涉與郭沫若從增田涉在《臺灣文藝》的論爭，解讀成魯迅與創造社之間論爭所延續的餘波。因此，從這樣的衝突可以看到中國「左聯」內部不同派別的嫌隙，已然延展至海外其他地區，雖是短暫的零星火花，但對臺灣來說，殖民母國與原鄉祖國兩位具份量地位的作家，在殖民地小小刊物的論爭，也引起臺灣讀者不少的關注。

綜觀整場論爭不難發現，為何增田涉與魯迅對創造社同仁還存有不滿，而郭沫若同樣的對魯迅也仍充滿敵意。這樣的敵我意識其實在賴明弘訪問郭沫若時，郭沫若已經在態度上表現得一清二楚。在《臺灣文藝》發表〈訪問郭沫若先生〉一文，內容中提到當賴明弘問到郭沫若為何近來沒有新作品的發表，上海不是有部分的文學園地可以發表時，只見郭沫若出現了一段令人玩味的問答：「是，文學有黨派性，即魯迅一派為中心的。……」。<sup>24</sup>從郭沫若的談話中可清楚理解到，派系之間互不相容的情形，並未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而解決，相反地，創造社與魯迅之間的嫌隙仍是持續存在著。從另一方面來說，文學刊物若在特定人士主導之下，不但編輯者以自身「品味」來決定雜誌走向與刊載內容，投稿者也會取決編輯者是誰來決定自己是否有意願來進行投稿。此外，郭沫若與魯迅之間的心結，最主要仍在於兩人文學觀念的差異極大，以及派系的誤會，加上文人相輕的自我意識濃厚，也使這兩位中國重量級作家不但素未謀面，也未有過任何書信往來的紀錄，成

---

日)。

24 賴明弘，〈訪問郭沫若先生〉，《臺灣文藝》，第2卷第2期（昭和10年（1935）2月1日）。



為中國文壇的遺憾。<sup>25</sup>

當〈魯迅傳〉連載完畢時，《臺灣文藝》的「編輯後記」還對這場論爭「意猶未盡」的做了補述：「受到爭議的〈魯迅傳〉在本期結束。讀者希望郭沫若先生寄來水落石出的原稿」。<sup>26</sup>但對臺灣讀者來說，除了論爭本身相當引人關注之外，增田涉的〈魯迅傳〉也讓臺灣對魯迅的生平有更為全面的瞭解。除此之外，森次勳（由賴明弘翻譯）與蔡嵩林分別先後在《臺灣文藝》刊載有關中國文壇的介紹性文章，<sup>27</sup>內容也多有提及魯迅的消息，包括1930年代以後中國左翼文壇發展概況也都略有提及。

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中國、日本、臺灣，甚至是西方世界的左翼文化思潮皆有所流通，但臺灣所引介的對象，大多來自於日本。同樣地，也因為政治力的干預與介入，臺灣讀者要瞭解中國文壇或是中國左翼文化圈的消息，仍然是必須透過日本才能夠瞭解，如同賴明弘所言：

中國文學是臺灣文學的母體：也是有著不解之緣。攝取消化中國文學之精粹，是我們共通的欲求。可惜！近年來我們離開中國文學太遙太遠了，因為種種的情勢。<sup>28</sup>

確實，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斷絕了臺灣與中國文化上的直接流通，兩地之間的文化交流，多半要透過日本來做轉介。如此的情形呈現出臺灣文壇自1920年代到1930年代文化交流上的重大改變，過去以中國、日本雙軌的文化接受模式，因為政治因素被迫僅能從日本作為臺灣認識世界的窗口，當然這也包括了臺灣對文化母體—中國的認識。

如此的間接傳播，導致臺灣在接受魯迅思想時，並不能以直接取自於中國，反而必須接收來自日本的第二手、第三手的資料。這不但使臺灣在瞭解魯迅上產生時

---

25 參考朱文華，〈第三卷 郭沫若—魯迅〉，《魯迅、胡適、郭沫若連環比較評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10月）。

26 〈編輯後記〉，《臺灣文藝》，第2卷第4期（昭和10年（1935）4月1日）。

27 森次勳著、賴明弘譯，〈中國文壇的近況〉，《臺灣文藝》，第2卷第5期（昭和10年（1935）5月1日）。蔡嵩林，〈中國文壇的近況〉，第2卷第7期（昭和10年（1935）7月1日）。

28 森次勳著、賴明弘譯，〈中國文壇的近況〉，《臺灣文藝》，第2卷第5期（昭和10年（1935）5月1日）。

間性的延遲，在魯迅較為細緻、繁複的思想，臺灣也因為時空的限制，以及獲取資料的不足而無法有深入的理解。像是魯迅與新月派的論爭、與周揚在「第三種人」的論爭，乃至於後來「國防文學」的論爭，皆未曾有任何臺灣作家提及或是提出介紹與討論。於此，也造成中國與臺灣在對於魯迅的認知上呈現明顯的落差。當中國文化界將魯迅奉為左翼革命青年導師，引導中國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法西斯統治，以實踐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時，臺灣方面對魯迅瞭解最多的仍停留在他的小說研究。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臺灣對魯迅的認知產生隔閡與距離，反倒使臺灣對魯迅的理解，是實實在在的來自於作品本身，藉由魯迅的作品直接面對魯迅，從作品的層面瞭解魯迅的精神。而不是透過文學評論，或是其他「權威」的說法來理解魯迅，瞭解到被特定人士刻意建構的魯迅形象。換句話說，魯迅傳播在臺灣的隔閡，反倒給了臺灣認識魯迅的空間，沒有看到被擦脂抹粉的魯迅，而是透過魯迅的文學文本內容理解魯迅的思想。如此的「意外收穫」，不但是歷史的偶然，更造成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作家對魯迅思想解讀的南轅北轍，呈現「一個魯迅，兩種詮釋」的魯迅熱潮。<sup>29</sup>

儘管這場論戰臺灣人處於觀看的位置，並沒有介入中、日兩大作家的論爭，無法判定臺灣人究竟瞭解魯迅的思想有多少，並且對於郭沫若、增田涉兩大作家論爭的看法，但透過兩人之間的答辯過程，臺灣讀者可以理解到魯迅及其時代的相關問題。下面，我們繼續要來談此時期的另一波談論魯迅的焦點—「魯迅逝世的相關紀念文章」。

---

29 有關戰後初期魯迅思潮在臺傳播，目前學界有徐秀慧，《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1945-1949）》（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7月）。徐秀慧，〈跨國界與跨語際的魯迅翻譯（1925-1949）：中、日、臺反法西斯的「地下火」與臺灣光復初期「魯迅戰鬥精神的再現」〉，《魯迅：跨文化對話：紀念魯迅逝世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州：大象，2006年10月）。徐秀慧，〈「魯迅的戰鬥精神」對臺灣的影響〉，《華文文學》，第77期（2006年6月）。李昀陽，〈論戰後初期魯迅思想再臺灣的轉化〉，《島語》，5（2005年6月）。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12月）。楊傑銘，〈地下火的虛實辯證：黃榮燦與中國左翼文化在臺的傳播〉，收入於《第五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7月）。

## 五、魯迅逝世的相關紀念文章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的消息震撼全球，由於事出突然，對於內亂外患嚴重的中國來說，文化界精神領袖—魯迅的死是相當大的打擊。在中國共產黨的策動之下，巧妙地利用魯迅逝世紀念活動的機會，統合中國左翼文化陣線，持續推行「國防文學」的主張，藉此一方面對抗日本帝國勢力的入侵，一方面抵抗國民黨的掃蕩，並透過推崇魯迅來凝聚人心，掌握中國的文化領導權。在中國共產黨的包裝之下，魯迅從無產階級的同路人、合作夥伴的角色，被納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精神革命導師。此舉讓中國共產黨可獲得更多中國人民的支援，以抵抗國民黨強力剿共的掃蕩政策。換言之，如此的作法讓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由1930年代的極左路線，往聯合陣線的中間路線靠攏，透過將魯迅塑造為精神導師的形象，更有利於中國共產黨在無軍事奧援的情形下，利用輿論、社會力量，以論述的方式，將蔣介石建構為極右的法西斯色彩政權，以及分裂國家的民族罪人。此舉讓中國共產黨取得民族與階級論述的統合，成功地在1936年年底「西安事變」後脫困，在對日抗戰中逐漸壯大勢力。

相較於中國共產黨對於紀念魯迅隱含著政治性的意義，臺灣在對於魯迅逝世的想法，則不若中國方面那麼複雜。有關魯迅逝世的訊息，臺灣在第一時間從《臺灣日日新報》也已經得知此消息，這封短訊是如此寫的：「上海19日電。中國現代第一文豪魯迅〈周樹人〉因宿疾心臟性氣喘病惡化，於19日上午5時25分於上海自宅去世。享年五十六。」<sup>30</sup>此外，在《臺灣日日新報》10月23日的新聞，也刊載了高桑末秀對魯迅的看法。文中概略述及魯迅在文壇發跡過程，以及他在日本所接受到的啟蒙思想的概況與經過，文章內容雖沒有對魯迅去世的悼念話語，但高桑末秀透過簡短介紹魯迅的事蹟，可看作是對其逝世的追悼。

針對魯迅逝世臺人方面的回應，以《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9期上所刊載的兩篇文章為最早。當時作為臺人文化陣線的刊物《臺灣文藝》已經停刊，隨之取代的

---

30 〈魯迅氏逝く〉，《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0月20日。報紙原文為日文，此處為筆者自行作出的中文翻譯。

《臺灣新文學》成為臺灣人發表作品的園地。而這兩篇文章分別是：王詩琅在《臺灣新文學》上的卷頭語〈魯迅を悼む〉、黃得時的〈大文豪魯迅逝く：その生涯と作品を顧みて〉。<sup>31</sup>

以〈魯迅を悼む〉來說，它除了談及魯迅在五四運動下反封建、抵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之外，亦加上左翼的語句來詮釋魯迅，這相當明顯的與《臺灣新文學》的鮮明左翼立場有相當大的關係。王詩琅本身在1920年代末期早已左傾，也曾參加過無政府組織「臺灣黑色青年聯盟」而被逮捕，對當時臺灣左翼青年來說，基本上並未明確的區分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差別，像是「臺共」黨員王萬得、翁澤生、蔡孝乾等人，也都是「臺灣黑色青年聯盟」的成員。這群人所看見的，並非「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差異，而是他們的共同之處，也就是對弱小民族、弱勢階級的支持，這也是王詩琅思想的核心。我們若以此來看王詩琅對魯迅的評價，就可看見他對這樣精神的堅持：

他的作品雖也跟他的作品性格的特異有關，但對於現實有股不放棄的追求的熱情，因此成就了提高大半的價值。與「時代的先驅」的他，一起走在這個時代，在此清流之下能粗茶淡飯的精神才是真正的能打動人心。「跟執筆的手比起來，四處逃跑的雙腳顯得比較忙」的他，活在真理之中，不斷追求的態度還有努力，才是足以證明他存在的理由。

王詩琅是以精神層面來探討魯迅所信念的「真理」，在面對蔣介石政府的壓迫時，魯迅的抵抗與反抗精神是王詩琅所推崇的。因此，對於魯迅逝世，王詩琅特重他的精神性與世界性的地位：「今天，他從我們的身邊離開了。他的死不只是中國文壇的損失，也必定是世界文學上的一大憾事。」王詩琅看見魯迅在普世性精神上對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的影響，對臺灣而言也是如此，因而會以世界的角度來觀看魯迅，而非中國民族的角度談論魯迅。

在同一期的雜誌上，還有黃得時的〈大文豪魯迅逝く：その生涯と作品を顧みて〉，此文相較過去的文章，更為完整的介紹魯迅的思想與生命歷程，並以自己認

---

31 《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9期的卷頭語，並未屬名為何人所撰寫，但據中島利郎的考察則認定為王詩琅所撰寫。參見中島利郎，〈關於雜誌《臺灣新文學》中的魯迅之哀悼文〉，臺灣文學研究會，《臺灣文學研究會會報》，第2期（1982年12月31日）。

識魯迅著作的經歷出發，談魯迅對他自身的影響。黃得時提到：

昭和四年春，我從中學畢業後去了哥哥所在的東京。時間是在一個天氣暖和的下午。我和哥哥一起到中國青年會館。這個會館除了中國的留學生會到此集結之外，也會放映中國的電影、賣中國的新叢書等等。……作者名為「魯迅」。那一瞬間，我認為「魯迅」可能是一位西方人，因為就中國人的姓名來說太感覺疏遠了。不過總之，因為是有名的書所以就買了。其它還有「郁達夫代表作」以及周全平的「夢裡的微笑」、龔冰廬的「炭礦夫」等都一併買下來。那天晚上，我馬上就讀了「吶喊」。不過以為是西洋人的作者「魯迅」，原來是一位中國人，而且有來東京留學過等，這些事是看了序文以後才知道。那時候，我真想找個洞鑽進去。但對於魯迅的名字，跟其他的作家比起來，我還是比較有親切感。

這就是我知道魯迅，閱讀魯迅作品的開始。<sup>32</sup>

昭和四年（1929）以前，張我軍已經在《臺灣民報》上轉載一系列有關魯迅的著作，但黃得時對於魯迅的認識，卻是到了日本之後才有瞭解，這形成相當有趣的問題。究竟對臺灣人來說，魯迅是否是知名的作家，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但可以瞭解到的是，對黃得時來說，雖曾聽聞過「魯迅」這一個人，但真正認識他，知道他是中國人，是要到他閱讀過《吶喊》之後的事了。

在文章中，黃得時對於魯迅介紹相當詳細，像是他的代表著作《狂人日記》、《阿Q正傳》、《中國小說史略》都是介紹的重點。此外，從黃得時的討論裡可以看到，他所參考的材料多半來自日本，而非中國。因而在內容介紹上，雖是以魯迅本人作為重點，但全文仍有相當的篇幅在談論日本的魯迅作品翻譯情形，以及日本討論魯迅的概況。但在文中，黃得時並未談及魯迅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歷史，此外，魯迅的雜文部分也沒有詳細探討，這很可能是因為魯迅的雜文因時空、地域、文化環境的限制，因而並未在中國以外的其他地區流通。也就是說，即便魯迅是世

---

32 黃得時，〈大文豪魯迅逝く：その生涯と作品を顧みて〉，《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9期（1936年11月1日）。

界級的大文豪，《阿Q正傳》曾經翻譯成日、英、德、法、俄等多國語言，但雜文此文體為了因應社會的戰鬥性與時局快速的變遷，故無法在華文以外的其他地區流通。即便雜文在內容上同樣具有人道主義關懷的普世性價值，但因為撰寫形式上的限制，使得雜文無法獲得其他國家的共鳴。

其實黃得時早在1935年《第一線》上就曾發表〈小說人物的描寫〉，以魯迅的譯作《工人綏惠略夫》、《阿Q正傳》為例，討論小說應該如何撰寫。黃得時在文中結尾時談到，臺灣文壇的創作模式大抵是以「事件」作為故事核心，而魯迅則會經營小說人物形象：

末了，我們站在人物描寫的立場，來看看臺灣的現文壇小說狀態吧！在臺灣所發表過的作品，大體是以「事件」為中心。作者只求很多的問題——聘金廢止，迷信打破，婚姻自由，查某嫖解放以及蓄妾排斥——壓縮在一個作品裡，完全像「問題的展覽會」一樣，表面上弄得五花八門，鮮艷奪目，事實上卻沒有什麼藝術價值。作者自身，只汲汲於事件的解剖進展和解決，再有什麼時間能夠去顧及性格的描寫呢？這在啓蒙時代，是不得已的現象。今後望諸作家，對於人物描寫這方面，盡點功夫去研究，以完成我們貴臺灣的藝術殿堂吧！<sup>33</sup>

黃得時認為，臺灣的小說過於以議題貫穿主軸，容易使小說呈現出強烈的意圖性，這不但會弱化小說的藝術性，也容易讓小說人物的描繪顯現不出個性。而魯迅的《阿Q正傳》正好克服了這樣的缺陷，不但賦予故事社會的啟發意義，也成功的塑造小說人物的形象。

較無鮮明黨派色彩，甚至政治光譜較傾向右派的黃得時，在左翼色彩極為濃厚的《第一線》撰寫這樣的文章，顯然很有相當明顯的針對性。似乎有意針對當時臺灣左翼文學的文學觀：注重意識形態、教育的功能，較缺乏藝術性、美感的追求，提出不一樣的反思空間。像是內文最後一句提到：「今後望諸作家，對於人物描寫這方面，盡點功夫去研究，以完成我們貴臺灣的藝術殿堂吧！」此句話就暗藏著對當時臺灣文壇不注重意象、小說人物技巧描寫的不滿，並以「『貴』臺灣的藝術殿

---

33 黃得時，〈小說人物的描寫〉，《第一線》，第2期（1935年1月1日）。

堂」加以反諷。總的來說，雖然黃得時的〈小說人物的描寫〉一文，並未引發其他臺灣作家的討論與共鳴，但可以發現黃氏所要批判的是，只是注重文學內容而忽略文學技巧的小說作品，因而以魯迅的小說為例，希望臺灣作家能夠在小說創作上達到形式與內容並置的水準。

從黃得時在〈小說人物的描寫〉中詳細分析《阿Q正傳》的書寫技法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大文豪魯迅逝く：その生涯と作品を顧みて〉，黃得時同樣以小說分析的方式，詳細談論魯迅的小說作品，特別是《阿Q正傳》皆是這兩篇文章介紹的重點。對於《阿Q正傳》的評價，黃得時這樣說：「這一代的名著《阿Q正傳》，不僅僅在本國受到廣泛的閱讀，也翻譯成日、英、德、法、俄等各國語言，連世界語(Esperanto)譯本也有。恐怕東洋的文學作品之中，有這麼多國家的譯本的也只有這一本了。」<sup>34</sup>黃得時將《阿Q正傳》放在世界文學的架構去看，認為被翻譯成多國語言的《阿Q正傳》是具有世界及文學作品的地位，也是東洋文學中唯一一本可以翻譯成多國語言的作品。因此，我們可以由魯迅逝世的相關紀念文章，看見眾人對魯迅逝世的關心，不論是極具左翼色彩的王詩琅，或是較為右傾的黃得時，對魯迅同樣都有相當高的評價。

## 六、結 論

總結來說，本論文從傳播的角度出發，以《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兩份1930年代重要的臺人作家刊物作為觀察場域，探討魯迅在當時是如何受到討論，並且是以怎樣的面貌被接受。在這兩份雜誌中討論魯迅的作家文章並不多，且集中於特定的幾位作家，甚至是日本與中國的作家。我們很難從這樣的文化現象來判定，臺灣讀者究竟受到魯迅影響的程度有多少、範圍有多廣，但是唯一能夠瞭解的是，當時的臺灣讀者從《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究竟閱讀到怎樣的魯迅相關文章，瞭解了怎樣的魯迅形象。

從《臺灣文藝》到《臺灣新文學》，從「增田涉與郭沫若之間的論爭」到「魯

---

34 黃得時，〈大文豪魯迅逝く：その生涯と作品を顧みて〉，《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9期（1936年11月1日）。

迅逝世紀念文章」的發表，我們可以看到，中、日、臺三地文化交流的概況，以及臺灣在傳播與接受魯迅思想時，往往扣合自身土地與社會的問題。增田涉與郭沫若之間的論爭所顯現的，是魯迅與創造社論爭的餘波，並未因為左聯的成立以後就團結一致，內部仍然有著宗派嫌隙。臺灣的讀者對於「增田涉與郭沫若之間的論爭」之所以會抱持著興趣，在於殖民母國與文化母國的兩大作家在臺灣的雜誌中進行論爭，且論爭的焦點是中國新文學之父的魯迅。這讓臺灣知識分子感到相當的興奮，興奮之處在於臺灣文壇能有重量級文化人士的論戰，讓臺灣人能直接接觸創造社與魯迅的論爭議題。

而魯迅的逝世噩耗，也意外的成為1930年代另一次談論魯迅的焦點。在《臺灣新文學》中的兩篇紀念魯迅的文章，成為臺灣文化圈對魯迅逝世所做出最後的哀悼。誠然，紀念魯迅逝世的文章，在數量上雖然並不多，但在原本就很艱困在堅持殖民地臺灣的文化園地，能有這樣的篇幅、數量來紀念，也是值得欣慰的事了。

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與文化母國—中國之間的關係，會時時被日本殖民政府放大檢視，深恐臺灣與中國之間的暗通款曲，顛覆日本帝國在臺的殖民統治。因此，臺灣在日本統治下與中國文化的交流是被限制的，不論是報章雜誌刊載內容的審核，或是書籍出版與流通，在日本殖民帝國的強力監控下，中國文化與臺灣文化的交流是存在著隔閡。當時能夠突破這樣的困境直接接觸到中國文化的，大多都是留學中國、日本的臺灣知識分子，他們在異地擺脫了日本殖民政府的束縛，直接接觸中國新文化、新文學，也將其帶回臺灣讓一般民眾瞭解，成為臺灣能接受中國文化的關鍵因素，張我軍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張我軍留學中國期間，適逢五四運動的勃興，在中國汲取到許多五四運動的新思潮，並將之轉介到臺灣，成為臺灣新文學發展的養分。像是《臺灣民報》上所刊載的中國新文學著作，以及中國白話文學理論，許多都是透過張我軍的轉介，臺灣民眾才有機會接觸，而魯迅的相關著作與思潮，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被介紹到臺灣的。

除了張我軍之外，日治時期的幾位臺灣著名作家，也同樣受到魯迅思想的相當影響。雖說在《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之後，戰爭時期下談論魯迅相關的文章更為稀少，但這並不代表臺灣人忘記了魯迅，相反地在書信、日記、閱讀藏書



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魯迅的思想與精神影響著臺灣作家與臺灣知識分子，而這其中包括了楊逵、龍瑛宗、鍾理和等臺灣作家，以不同的方式理解魯迅、認識魯迅。儘管這種影響，我們很難用現存的文獻與資料，來判定臺灣作家受到影響的層度、深淺，但可以知道的是，所謂的魯迅精神，成為當時東亞地區跨國性的共通語言。

（責任編輯：侯坤宏）

## 徵引書目

### (一) 專書

-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一九二〇～一九五〇》。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8月。
-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7月修訂版。
- 房向東，《魯迅是非》。上海：東方出版社，2008年1月。
- 葛濤，《魯迅文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5月。
- 張寧，《無數人們與無窮遠方：魯迅與左翼》。上海：復旦大學，2006年12月。
- 周國偉，《魯迅與日本友人》。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9月。
-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
-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
- 王宏志，《魯迅與「左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5月。
-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 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
- 魯迅，《魯迅全集》，1-18。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
- 陳建忠，《日據時期臺灣作家論 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8月。
- 孔海珠，《痛別魯迅》。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4年。
- 林賢治，《魯迅的最後十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4月。
-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
- 黃曼君編，《毛澤東文藝思想與中國文藝實踐》。湖北：華中師範大學，2002年。
- 葛濤、谷紅梅編，《聚焦“魯迅事件”》。福建：福建教育，2001年。
- 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正中書局，2000年9月。
- 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5月。
- 王培元，《抗戰時期的延安魯藝》。廣西：廣西師範大學，1999年5月。
- 張深切，《張深切全集》，第2卷。臺北：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月。

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 魯迅傳》。臺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

艾曉明，《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1991年。

陽翰笙，《左聯紀念集1930-1990》。上海：百家出版社，1990年。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年2月。

艾曉明，《中國左翼作家思潮探源》。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1991年。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

饒鴻競等編，《創造社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 （二）論文

辛翠玲、吳珮菁，〈竹內好的「自我介紹」：對抗亞洲內部的西方〉，《東亞研究》，第39卷第2期（2008年7月）。

陳芳明，〈臺灣文學與東亞魯迅〉，《文訊》，第267期（2008年1月）。

劉俊，〈論臺灣文學的「輸出」與「輸入」〉，《文訊》，第267期（2008年1月）。

陳芳明，〈臺灣魯迅學：一個東亞的思考〉，《文訊》，第248期（2006年6月）。

楊澤，〈在臺灣讀魯迅的國族文學〉，《中外文學》，第23卷第2期（1994年11月）。

張向華，〈一則有價值的報導—關於東京留日學生追弔魯迅大會〉，《魯迅研究動態》，第10期（1986年）。

